

南華真經循本釋題
莊子集書
莊子學史略

方勇

著

雖恢恠譎怪

佚宕於六經外

譬猶天地日月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莊學史略



臥雲松石

雲在天
地日月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北京

庄学史略

方勇

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学史略 / 方勇编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08. 5
ISBN 978-7-80752-149-5

I. 庄… II. 方… III. ①道家②庄子—研究 IV. 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9597 号

庄学史略

方 勇 著

策划组稿	何 锐
责任编辑	谢春雷
封面设计	徐儒宗
封面题签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
出 版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
	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
	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(028)8260151
版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48mm
印 张	25.125
字 数	60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149-5
定 价	6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序

陈鼓应

方勇教授《庄学史略》即将付梓，嘱我为其作序。看着眼前厚厚一摞书稿，又恰逢其《庄子学史》也将出版，欣喜之余，颇有些感慨。在当前崇尚物质利益的风气下，方勇教授能潜心庄子学研究领域十余年，孜孜以求，完成《庄子学史》这样近二百万字的庄学巨著，实在是学术界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，让我十分感动。

一

庄周学派留下了一部《庄子》，由于它那芒忽恣纵的语言风格，以及高远深邃的思想意境，常被正统派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扭曲，所谓消极、出世是常有的误解。但是我想，中国文化中如果欠缺了庄子的生命情调和美感情怀，那么中国文学、艺术和美学会成为什么样的光景？如果中国哲学只有孔孟之道，而欠缺老庄的哲学理论和境界，那么它会单调到什么样的程度？

我是学哲学的，对《庄子》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由尼采进入《庄子》，即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《庄子》，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启发。上



世纪 70 年代之后，我在美国期间的所见所闻，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自由、民主扩大到了社群、民族的理念，从而对《庄子》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“归根”和“积厚之功”的层面上去。而进入新世纪后，2001 年的“9·11”袭击事件导致了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，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触动，使我更加看清霸强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。由此推到《庄子》研究上，也使我更加注重多重视角、多重观点地去看问题。当然，上述三个阶段不是割裂的，而是紧密联系的，只不过三者间有一个大概的分期罢了。

我求学的年代，正处于新、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浪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。这种空气令人窒息，我便从尼采的《愉快的智慧》、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等著作中汲取着营养。尼采曾经自称为“自由精神者”，他说“不管我们到哪里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”，“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，不要跟随我——只是建立你自己！只是成为你自己。”^①这种张扬的自由给了我很多的启示。从 1960 到 1963 年之间，我研究的主题由尼采进入到庄子，尼采对西方文化进行价值“转换”，引发了我关注庄子对文化与哲学的价值重估。譬如读《庄子·逍遥游》第一段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”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“游”，在“放”，在“精神自由”，这可与尼采的观点相互对应，庄子的“逍遥游”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。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，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

① 见尼采《愉快的智慧》。

摆脱出来，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中。

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，我的心思渐渐由当初的激愤沉淀下来，进而体会到“积厚”的重要性。鲲在海底深蓄厚养，须得有积厚之功；大鹏若没有经过心灵的沉淀与累积，也不可能自在高举。老子说：“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^①走千里路，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耐心。同时在客观条件上，如果没有北海之大，就不能蓄养巨鲲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环境，就不能培养出辽阔的眼界、宽广的心胸。而蓄养巨鲲，除了溟海之大，自身还得有深蓄厚养的修持工夫，要日积月累，由量变而质变。“化而为鹏”，这意味着生命中气质变化所需要具备的主客观条件。

从哲学角度来讲，鲲化鹏飞寓言中所蕴涵的哲理，其一，体现在从工夫到境界的进程中。鲲的潜伏海底，深蓄厚养经由量变到质变，乃能化而为鸟；鹏之积厚展翅，奋翼高飞，这都是属于工夫修为的层次。而鹏之高举，层层超越，游心于无穷，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精神上达“天地境界”的层次。工夫论和境界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色，而鲲化鹏飞的寓言，正喻示着由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层层提升的进程。其二，体现在“为学”到“为道”的进程中。《老子》四十八章说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”“为学”是经验知识的累积，“为道”是精神境界的提升。老子似乎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，而且《老子》还说过“绝学无忧”^②，这样“为学”和“为道”成为不相挂搭的两个领域。不过，老子提出“为学”与“为道”的不同，确实是很重要的议

① 《老子》六十四章。

② 《老子》二十章。



题，但两者如何衔接，是否可以相通？这难题留给了庄子。在鲲鹏飞的寓言中，庄子喻示了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条进程，同时也隐含了“为学”通向“为道”的进程。《庄子》书中，写出许多由技入道的寓言，如庖丁解牛（《养生主》）、痾偻承蜩（《达生》）、梓庆为鐻（同上）、司马之捶钩者（《知北游》）等等，这些由技艺专精而呈现道境的生动故事，都表达出“为学日益”而通向“为道”的神妙高超境界。

近年来，特别是“9·11”袭击事件之后，我对庄子价值重估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，比如对“内圣外王之道”就有了一番新的理解。

中国哲学最高的理想“内圣外王”是由庄子提出。这主张影响各家各派，而后成为历代士人的言行指标。所谓“内圣”就是个人人格的修养，所谓“外王”就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与行动的投入。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代表而言，儒家侧重在伦理意识的启发和道德规范的实践，而道家的庄子，则着重在心灵开放和审美意境的阐扬，较偏于“内圣”方面的工夫。老子和孔子虽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，其理论建构是否完整也令人质疑。尽管如此，两者在历代知识阶层仍经常被提出讨论，而庄子的外王之道则较少被讨论到。不过“9·11”事件之后，我不禁联想到，庄子的齐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发展趋势中，其实颇具现代意义。审视西方文化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，西方中心主义者对弱势国家及弱势文化缺乏尊重，甚至加以欺压；从宗教哲学的角度，西方文化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，以一神论的思想，将上帝视为至上神，但同一个上帝的子民却敌我矛盾，流于天无二日的紧张与矛盾之中。这使我想到庄子所创造的“十日并出”的寓言。这种从个体到国族的自我中心，使人类的生命形态面临了重重的困境，正如尼采所

说的：“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。”

庄子哲学的精神不仅止于《齐物论》篇，但《齐物论》篇的齐物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苦难特别具有现代意义。其一，反省自我中心主义。自我中心的单边主义思维，容易陷入独断的观点。人类一旦陷入自我中心，则以单边的思考，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，到国族之间的冲突，到整体人类的衰败，这将造成整个地球的严重毁损。而庄子的齐物精神，则是以多边思考的开放性，主张多维视角、多重观点。其二，追求和谐的同通精神。庄子说：“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恹慵怪，道通为一。”（《齐物论》）这段话蕴涵两个层面的意思。首先，“恢恹慵怪”即是对于个体的张扬，从而到个别民族、文化的张扬。意思是尊重每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别，而以齐物精神等同观之；“道通为一”则是说个体虽然千差万别，但在“道”的世界里却可以相互会通。所以这段话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殊异性，另一方面又从同一性与共通性的角度，将个体殊相引向整全，而在“道”的整全世界里打通了万有存在的隔阂。这种齐物精神，要有多边的思考及开阔的心胸才能达到。

二

如果将哲学分成概念哲学与想象哲学的话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，亚里士多德属于前者，柏拉图则应属于后者。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，老子当属于前者，而庄子则属于后者。庄子以诗一般的语言，充满隐喻性的叙述，在思想的诠释上留下想象的空间。无论在文学、艺术及哲学各领域，庄子皆提供给后代丰富的思想资源。概略而言，庄子对于后代的影响应有三个方面。一是开创了中国的文人传统，二是开启了审美的人生观，三是在后代哲学理



论体系建构上起了积极的影响。

首先，在开创中国文人传统方面。先秦时代，士人群起而出，然而大多是依违在仕与隐之间。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之间的冲突与两难，既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（《天下》），又“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”（同上），在板荡的时代中，做一位清醒者、殊异者。然而又不同于屈原，庄子的清醒与殊异，并非基于愤世之孤傲与洁身之坚持，而是以广袤无垠的宇宙意识与天地精神，对世间多怀一份醒觉的洞悉与深情的理解。这样一种对世间的醒觉与深情，后代之嵇康未尝不是，陶潜何曾不然，东坡恐亦如此。

其次，在开启审美的人生观方面。庄子那种“原天地之美，达万物之理”（《知北游》）的宇宙心灵，以及“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”（《德充符》）的本真性情观，皆透显出一种艺术的、审美的精神。这种审美精神，在中国艺术美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影响。

其三，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。我们应该看到，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，庄子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实不容忽视。如以宋明理学或心学来说，在理、气、心三体系中，除了孟子的心性论，庄子相关的哲学论题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。张载的“太虚即气”，渊源自庄子的气论，而程颐的“理一分殊”，更是以老子“道”——“德”、庄子“道”——“理”的关系架构为其理论模式。可见宋明理学虽强调儒学道统，然而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，多依循老、庄的哲学论题与思维模式。

三

《庄子》素以难解著称。由于《庄子》文本的开放性，在庄学阐释史上，存在着多种阐释指向，以道解庄者有之，以儒解庄

者有之，以《易》解庄者有之，以佛解庄者有之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。如宋、明、清时期，以儒解庄就成为一种潮流，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、朱得之《庄子通义》、林云铭《庄子因》、宣颖《南华经解》、林仲懿《南华本义》、陆树芝《庄子雪》等一批重要庄子学著作都具有这种特征。因此，《庄子》与其他先秦典籍有着明显的不同，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著作不管如何深奥，它们的阐释指向基本上是单一的、明晰的，而《庄子》阐释指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理解《庄子》的难度。

方勇教授倾十多年的心力，收集自先秦至民国庄子学著作二百余种，并对这些著作详加梳理、研究，著成了近二百万字的《庄子学史》。这部巨著，不仅可以向人们展示庄子学各阶段发展的概貌、特征，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，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庄学工具书的性质，对《庄子》文本的阐发及与《庄子》相关文化事象的理解也有襄助之功。

《庄学史略》是在《庄子学史》基础上提炼而成。具体说来，此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其一，资料宏富。方勇教授二十多年来主要致力于《庄子》学术研究，并系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《庄子》文献搜辑、整理工作，其所编撰的《庄子文献集成》、《庄子纂要》等大型书籍也正在出版之中，这在庄学研究史上可谓是空前的。其《庄学史略》乃至《庄子学史》正是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集中体现着其《庄子》学术的研究成果。正是基于系统的搜辑、整理，使得《庄学史略》既能够重点梳理《庄子》学术本身发展史，又涉及庄学与道教、佛教、文学、艺术、医学之关系，资料之宏富可想而知，此不赘述。

其二，论述全面。《庄学史略》虽是方勇教授《庄子学史》



的缩简本，但论述仍颇为全面。该书以朝代分期，论述了自战国至清末庄子学发展的大势。从整体方面而言，既对郭象、陆德明、成玄英、王雱、陈景元、林希逸、褚伯秀、杨慎、释性通、陆西星、沈一贯、释德清、焦竑、方以智、王夫之、林云铭、宣颖、孙嘉淦、陆树芝、刘凤苞、章炳麟等人的庄学巨著予以重点阐释，又对刘安、班固、王弼、阮籍、崔譔、向秀、司马彪、魏徵、文如海、马总、罗勉道、刘辰翁、黄震、王应麟、朱得之、王世贞、归有光、谭元春、金圣叹、高秋月、徐廷槐、藏云山房主人、林仲懿、胡文英等人的庄学著作予以探析，涉及著作数百部。并且，《庄学史略》立足于中国学术发展史，对庄子学与佛教、道教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之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，如在魏晋南北朝、隋唐等章节中，单设佛教学者、道教学者的庄子学，使庄学与佛教、道教之关系甚为明晰。即便是对庄学与公安派、竟陵派、明末遗民、桐城派、乾嘉学派等的关系也进行了细致分析，使庄学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从而可窥见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概貌。

其三，论点精当。《庄学史略》立论新颖，常常以概括性用语简要说明庄子学著作的特征，叠有新见。如在阐释王夫之《庄子解》时，方勇教授从“‘未始出吾宗’——对庄子思想脉络的梳理”、“‘探化理于玄微’——对庄子思想观点的呈露”、“‘循斯须之当’——对庄子思想的发挥”三个方面来分析王夫之庄学的特征，其中在论述“探化理于玄微”内容时，又简要概括了“引庄解庄”、“以形象解庄”、“以史解庄”、“以天文解庄”四个方面，简洁明了。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庄周本传、王安石《庄周论》、苏轼《庄子祠堂记》等虽不是庄学专著，却在《庄子》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方勇教授对此十分重视，

对它们分别予以详细解析。如对苏轼《庄子祠堂记》，方教授提炼出“对蒙城县为庄周故里之说的默许”、“倡导‘庄子助孔子’之说”、“指出《庄子》中有伪作”三点，并指出“苏轼关于‘庄子助孔子’的说法却顺应了儒、道、释三教日益走向融合的大趋势，他关于《庄子》中有伪作的说法又真正开启了历代众多学者重视探讨、研究《庄子》作者问题的新风气，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”，这些论点都是很准确的。

其四，重源清流。在《庄学史略》中，方勇教授注意梳理、考证庄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，寻其源头，查其影响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。如经方教授考证，“老庄”并称始于《淮南子》，黄震《黄氏日抄》第一次提出了庄子“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”的说法，陆西星《南华真经副墨》第一次提出了《庄子》文脉具有“藕断丝连”、“草蛇纤线”之妙等全新见解，王应麟《庄子逸篇》是庄子学史上第一部辑佚专著等，这些观点对人们了解《庄子》学史的发展大有裨益。对于一些重要庄子学巨著的影响，方勇教授也能够详加论证，如在评论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的影响时说：“庄子学经过元代及明代前期的相对沉寂之后，到明代后期便迅速崛起，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的影响正是伴随着这一崛起而得以进一步扩大的。如陆西星《南华真经副墨》这部作为明代后期庄子学崛起的标志性著作，虽然对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持有一些异议，但仍显示出了其对林氏此著的诸多承因痕迹。稍后，释德清的《庄子内篇注》在以佛解庄的道路上又有所前进，而其评析《庄子》文章所谓有‘文章变化鼓舞处’、‘诙谐戏剧之意’、‘笔端鼓舞’云云，则又是对林希逸评析《庄子》文字血脉时所用概念、术语的进一步运用。此外，焦竑《庄子翼》还收录了林希逸的《庄子口义》，而孙应鳌《庄义要删》、李廷机《庄子玄言评



苑》、陈深《庄子品节》、陈懿典《南华经精解》、沈汝绅《南华经集评》、孙大绶《南华真经副墨校释》等等，则每引林氏《庄子口义》之说以解《庄子》。总之，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对明代后期庄子学的影响之大，几乎可以跟郭象《庄子注》的影响相仿佛。”通过方勇教授的梳理，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的影响之大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《庄学史略》出版之际，聊作数语，既是对自己多年来从事庄子学研究的一种总结，也是对方勇教授该著作的一种学习体会。《庄学史略》是方勇教授的博士后张洪兴在方勇《庄子学史》的基础上删削、缩减而成，这其中也凝结着他的一些心血，实可褒扬。后辈斯著，大有功德。

2008年7月

导 言

一、庄子其人

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，其生前默默无闻，死后也长时间少人问津，家世渊源、师承关系、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。在战国时期的人之中，除了惠施有“子之言大而无用”（《庄子·逍遥游》引）、荀子有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”（《解蔽》）等几句批评的话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流传下来，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。后世了解庄子，主要是通过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及《庄子》一书。《老子韩非列传》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，但目前看来，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，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；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，则大部分要来源于《庄子》一书。

庄子姓庄，名周，除去《汉书》为避汉明帝之讳而有时称其为严周外，世人皆称其庄子或庄周。但是庄子的字直至很晚才出现，隋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在“姓庄，名周”下注曰：“太史公云：‘字子休。’”但现在所见《史记》中，并无此说。此外，唐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序》、司马贞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。可见，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



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，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，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。至于庄子正式号“南华真人”是始于唐玄宗，但梁代梁旷著《南华论》，以及唐初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序》中已经称其为“南华”。“南华”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，北宋陈景元在《南华真经章句音义》中认为是取“离明英华”之义，清宣颖在《南华经解》中则认为这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。

根据司马迁的记载，庄子是“蒙人”，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“蒙”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说庄子居宋，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。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索隐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宋之蒙人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高诱注：“庄子名周，宋蒙县人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庄子”班固自注：“名周，宋人。”张衡《髑髅赋》：“吾宋人也，姓庄名周。”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，因此有的唐代学者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，便认为庄子为梁人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等，其实只是一种误解。

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，但其确切的生卒年月由于年代久远，缺乏确凿证据，已无法考证，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说庄子“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”，又说“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”，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、齐宣王、楚威王同时。近人马叙伦在《庄子年表》中认为，《庄子》中对魏文侯、武侯都称谥号，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，又称其为王，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、武侯之世，最晚也在惠王初年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庄子所处的年代，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，战争频发，生灵涂炭；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，文化成为一

种强烈的需要，于是“士”这一阶层大量出现。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，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，墨家门徒遍及天下，齐国“稷下之学”也正当鼎盛，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“无用”和贫困。《庄子》中描述他身住陋巷，以织草鞋为生，饿得形容枯槁，面孔黄瘦，受人讥嘲，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，还得向人借米；见魏王时，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，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。但《秋水》、《列御寇》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，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，庄子却表示“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生不仕，以快吾志焉”。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，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、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（《天下》）的风度，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。

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，但绝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，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“周尝为蒙漆园吏”，关于“漆园吏”的说法不一，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、生产漆器的小官。《庄子》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，如《人间世》篇“漆可用，故割之”，《骈拇》篇“待绳约胶漆而固者”。此外，《庄子》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，值得注意，如《养生主》篇“庖丁解牛”，《人间世》篇“匠石之齐”，《达生》篇“梓庆削木为鐻”等等，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。

庄子向来认为“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（《天下》），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，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，正如朱熹所说：“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，他只在僻处自说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五）但也有例外，便是惠施，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